



## 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（六）

吴官正

在北京读书的几年间，家里生活很困难，主要靠张锦裳每月26元的工资来维持。我每两年暑假回去一次。弟弟上学、结婚的钱和我从北京到家乡的来回路费都是靠她解决的。她十分节俭，很不容易，又要教书，又要带孩子，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。一次，她要我母亲给些布票，帮我买两件绒衣。母亲说：“官正在毛主席身边，还会冷到他？如果是你要，我就给你。”母亲没文化，她的话也可以理解。

1964年，奉上级要求，在指导老师带领下，我们七位同学去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，帮助02车间解决聚四氟乙烯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问题，然后再写出毕业论文。同学们分了三个组：裂解、精馏、聚合工段。我和郭树清分在聚合工段。那时聚合常因测量滞后，反应迟钝，引起聚合釜爆炸，迫切需要解决快速温度测量和聚四氟乙烯单体储罐的液面测量问题。这单体沸点很低，找遍

资料没有记载。我跑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，在一本物理化学书中得到启发。又听说武汉化工研究所生产全氟三丁胺，我设法买来，设计了一种液面计，按物理化学方法进行校正，终于获得成功。郭树清研制出的小惯性热电偶也很成功。这两项技术用在聚合工段，不但不再发生爆炸，而且聚四氟乙烯的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。这时裂解、精馏工段的测量和控制问题也都解决了。对此，研究所评价很高，学校很重视，上海市化工局领导也很高兴。我们在上海待了八个多月，各自写出了毕业论文，作为绝密资料存档。后来还为四川晨光化工厂设计过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。

今年3月，我爷爷去世了，享年83岁。我很思念一生贫困可怜的爷爷。

还是3月，全国研究生考试，我没有报考。5月初，清华大学党委来电报，要我立即返校参加5月20日的研究生补考。

我只好听组织的话，回去参加研究生考试，被录取了。我当时心里很矛盾：一方面考虑家里太穷，想早一天参加工作；另一方面又为考取研究生感到高兴。

1965年大学毕业前，校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领导接见了。我作为优秀毕业生，获得蒋校长颁发的奖章和证书。北京市委机关刊物《前线》杂志当年第15期以“清华大学量五班上海毕业设计队”署名，发表了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毕业设计工作》一文。清华大学学报还发表了文章：《迈进在红专大道上——记动力系优秀毕业生吴官正》。

读研究生期间，指导老师是在英国留过学的方崇智教授。他开了五本书的单子，其中三本俄文、两本英文，给的题目是“氧气顶吹炼钢的测量和控制”。最难的是热电偶的保护套管不过关。我到卢沟桥附近的耐火材料厂去调研，从资料中得知氧化锆套

管耐高温、耐腐蚀，我设计了套管，用上后，寿命提高了好几倍。

不久，学校决定让我去延庆参加“四清”运动。蹊跷的是，头一天发的一个月46元助学金，放在枕头下面，第二天一看只剩下6元。我心里又气又急，就叫工作队队员小连到商店给我买一斤饼干。给了他一元钱，他用了六角四分，还剩下三角六分交给我。正吃饼干的时候，蔡祖安队长看到了，说：“吴副队长，怎么一个人吃起饼干来了？”我说：“这个月学校发的46元助学金，40元不见了，心里不舒服，要小连买一斤饼干补补身体。”他“啊”了一声走了。我想，全让人家拿去了还不是一样过？真是阿Q精神，自我安慰。

在延庆县古城村搞“四清”，十分辛苦。按照规定，我们都在老乡家同吃同住。

最难受的是吃饭。那时老百姓很穷，收入很低，伙食很

差，常常吃不饱。塞北的冬天十分寒冷，一个冬天没有抹过澡，生了一身虱子。到1966年开春，把里面的衣服脱了，用开水泡，上面一层虱子。这时身上奇痒，才发现头上、眉毛上都长了虱子。真是债多不愁，虱多不痒啊！

有一次，蔡祖安队长回市里去了，县里通知开工作队领导会，我骑自行车去了。中午每人发三个大馒头，半碗红烧肉，半碗咸萝卜干，我又买了三个大馒头，全部吃下去了。过后不久，嘴里发干，就拼命喝水，胃胀得难受。下午开会时，我坐不下去了，频频往厕所跑，想吐又吐不出，想拉又拉不出，实在难受。到晚上未见好转，嘴里流涎水，整夜没睡好。第二天早上只喝了一碗稀饭，便骑自行车回到古城村。

没过几天，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事。县里办公室通知我，第二天上午工作团领导要来古城视察。我问要不要在老乡家派饭，他说不用麻

烦老乡。正午时分，来了三辆小车。一下车，县里来的领导说：“小吴，你去拿两瓶开水来。”我答应“好”。我提来开水，见桌子上摆满了茶蛋、油饼、包子，真希望也让我吃点儿，但没让跟着吃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：要求我们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我们和老乡过的什么日子，你们知道吗？还说不要麻烦老乡，全是鬼话，两面三刀！他们走后，我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也别麻烦老乡了，明天到养猪场搭伙去。”大家都同意，生活大有改善，后来每说到“不要麻烦老乡”，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这件事几乎影响了我一辈子。当领导的一定要以身作则，言传身教。

不久，我返回学校，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。后来“文革”开始，学校乱哄哄的。

1968年4月，我被分到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学校才补发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证。❏